

街头布道家杨格非及其汉文小说

宋莉华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摘要:对英国基督新教公理宗牧师杨格非及其所著汉文小说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他街头布道家的传道特点,以及这一特点与他汉文著述所运用的语体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着重分析了其代表作《引家当道》所展示的理想的中国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影响。

关键词:杨格非;汉文小说;《引家当道》

中图分类号:I 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2X(2010)03-0001-06

英国牧师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受基督新教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派遣来华,在中国度过了五十余年的传教生涯。他热衷于街头布道,并且著作等身,生平事迹可见于几种他的传记:纪立生(Thomas Gillison)著、夏贵三笔述《杨格非牧师略传》(广学会民国铅印本);国外布道英雄集第五册《杨格非传》[(Nelson Bitton 著,梅益盛(Isaac Mason)、周云路译,上海广学会 1924 年)];Robert Wardlaw Thompson 所著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A.C.Armstrong, 1906; Noel Gibbard 所著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idgend, 1998。关于他所著译的汉文小说,则并无专文论述,目前可见的研究主要是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发表的论文《19 世纪中国的传教士小说》(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①、韩国崇实大学教授吴淳邦(Oh Soon-bang)的论文《19 世纪传教士中文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②中有所提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杨格非及其所著汉文小说《引家当道》等作品展开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街头布道家——杨格非

杨格非初译名杨雅涵,也译为杨笃信、杨约翰,1861 年后改称杨格非。杨格非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的斯温西(Swansea),自幼丧母,父亲为一道德信徒,在杨格非幼年时便对他进行宗教教育。因而杨格非从小就立意献身上帝,8 岁入基督新教公理宗,16 岁开始领礼拜。1853 年加

入伦敦会,1855 年与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一同来华。初来时,在上海、松江、平湖、苏州、杭州等地活动,并拜见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获准在太平天国辖境内“随意传道,信教自由”。1860 年《北京条约》签定后,西方国家获准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1861 年夏,杨格非偕威尔逊(Robert Wilson)由上海溯江西,6 月 21 日到达内地重镇汉口,成为第一个进入湖北传教的新教传教士,并在此度过了五十余年的传道生涯。他在汉口(1861)、武昌(1867)、孝感(1880)、黄陂(1898)、天门皂市(1899)等许多地方都设立了传教点,并在这些地方创建仁济医院,因为在他看来“医病能解人的痛苦,感力更大。不久,便开了医院,医院的事功好,名誉也传的宽广。”^③1863 年,他在汉口夹街建起了华中地区第一所教堂——首恩堂。1864 年他又在汉口英国领事的支持下,购得武昌戈甲营的一块土地建造教堂即崇真堂。他在湖北设立了多达百余所福音堂,并远赴四川、湖南等地传教。1889 年,杨格非当选英格兰与威尔士公理会全国协会主席,爱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99 年他又在汉口创办博学书院。1905 年,杨格非在主持讲道时突然中风,1906 年不得不暂往美国纽约儿子家休养,次年仍回到汉口。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杨格非离开汉口,1912 年回到英国,不久病逝。

在传教方式上,杨格非特别注重对大众讲道并身体力行,因而被誉为“街头布道家”。

杨氏自来中国,欢喜对大众讲道,他深信在街头宣传

收稿日期:2010-0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课题“清代来华西人与白话文学”(06JC75011-4401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宋莉华(1971-),女,浙江宁波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韩南(Patrick Hanan):《19 世纪中国的传教士小说》,《哈佛亚洲研究学刊》卷 60 第 2 号,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②吴淳邦(Oh Soon-bang):《19 世纪传教士中文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台湾:《东华人文学报》,2006 年第 9 期。

③ Nelson Bitton:《杨格非传》,梅益盛、周云路译,《国外布道英雄集》第五册,上海广学会,1924 年,第 18 页。

福音,是很有趣的。所以他几乎成了一种惯例,每天一次或二次宣讲福音。因为这样,所以每年之中,听过杨氏讲道的,不下几十万人。他感到劝中国信徒,也照这种方法,在别处也如此办理。

……杨氏讲过一番,便坐在旁边,再由中国先生接着讲,听的人有的走出去,也有些新进来,每开堂便是讲几个钟头,这样办法,是普通常用的。^①₂₄₁₋₄₂

杨格非所推崇的直接面对大众讲道的方式,很少为天主教传教士所采用,却是中国传统的布道方式之一,符合中国听众的习惯:“在中国到处对众人宣讲,更正教^②的教士,才用这方法,以前的景教、天主教,他们有礼拜堂,但不肯在街头,或在讲堂,对大众用口讲道。在满清时代,官府派人讲《圣谕广训》,也或有人宣讲格言,从康熙发起这事,以为明然对大众劝善。是种有价值的工夫。此外更有宣卷说书的一派人,把中国的历史上的孝弟忠信的故事,演成小说,对众人宣讲,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动作,至于论到宗教,道教、佛教有它们的劝世文,但不见道士、和尚在街上讲经。”^③₃₉₋₄₀《圣谕广训》是康熙一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以及后来雍正对其详加申解的总称,实际上就是帝王统治传习录。《圣谕广训》在清代是官民最熟悉的日常必备之书,对于平民生活信持、信仰习惯,有教化之功。这与清廷提倡的宣讲圣谕不无关系。后又在民间发展出以宣讲因果报应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宣讲拾遗”。宣讲拾遗原自承袭宣讲圣谕,其内容扩大至地方善书,使木鱼书担当社会教化使命,较之圣谕收效更宏。这种中国本土的宣讲方式迅速被西方传教士吸收借鉴,而且看起来似乎颇有成效。咸丰四年,王韬曾受雇于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二位牧师,至松江、华亭、吴江、太湖洞庭山等地散书传教:“从麦慕二牧师上岸分书。彼都人士,竟来听讲,所携之书,顷刻都尽。”由于他们采行了中国宣讲拾遗的方式,乡民习见,不以为异。杨格非从咸丰八年(1858)开始在江南乡镇传教,也是由王韬担任助手。他在街头露天宣讲,并派发圣书,特别是选择在松江府考试之期,对考生宣教散书。王韬在日记中记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壬辰,“同杨君往钱莲溪家见诸友。欲进教者群集其舍,杨君为之讲书解道。”咸丰八年十月一日癸卯“时集于莲溪家,听杨君讲道者,共有10人:唐九翁、覃春、张藕汀东庭、王杏香东海、祝春泉志祥、陈啸园肇基,及孙静庵、杨研山、屠俊卿、陆君。如是夕饭于钱氏小舍,有盛饌。研山、啸园为介,礼意殷

勤,更深为归”^④有意思的是,杨格非既注重露天宣讲,同时也不放过州县科举考试的机会。他竟能分辨岁试科试,凡遇州县考试,他必出现在贡院附近的通衢大街人烟稠密处,对众宣讲。咸丰九年二月十六、十七日,昆山科试。杨格非于二月十七日赶到昆山,带着2500本《新约圣经》和500本新约、旧约俱有的《圣经》,向一万多名科考举子派发讲道。在杨格非看来,这种讲道的方法有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有传道劝世的益处,也帮助人开了演说的智识,你看时下要开一甚麽会,或是关乎地方上的改革,或是政治的讨论,都要对大众演讲,多半学得传道演讲的方法。”^⑤₄₀₋₄₁杨格非认为,他的布道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武昌起义时,他还留在汉口,他感到是他播撒的改良中国的种子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在杨氏回国船离汉口的时候,革命已经开火,炮声连珠轰发,好象庆贺杨氏前此撒布的改良种子得有成功,时时加一番助力,算来也不在少。”^⑥₅₀甲午海战后,中国士子受到强烈刺激,借取宣讲的方式传播新知,唤醒民众。其取法传教士的布道经验还是重拾民间宣讲拾遗之法,已不可辨析。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恐怕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⑦

杨格非少年时期就口才极好,许多教堂请他去讲道,在布道方面表现出特殊的才能。他曾描述过一段自己早年布道的经历,尽管其貌不扬甚至外形遭人歧视,却能以富于感染力的布道打动听众:

有位传道的朋友,再三请我到他的宣道堂替他讲书,因他要往别堂宣道。我应许而定规某日到该堂讲道,到了那一天,我比众人早到半点钟,看见长老、执事们聚集在堂外看门的房子里,我进去和他们接见,并说,我是杨格非。他们立刻变色,有失望的状态。大概看见我身矮,年轻,穿的普通寻常衣服,没有牧师高帽大衣的装饰,以为传道先生请我,是恶作剧,所以他们立刻决定,临时另请别人,不用我讲道。恰巧这时候,忽然进来一位传道先生,他是在别处讲书已毕,特意来此作晚礼拜,要安然听讲。长老们看见这人进来,以为非常的天幸。就对那先生说,你来得真巧,是上帝的安排,那先生说,我来是特意听杨格非讲书的。执事再三敦劝,请他讲书,在这商定的时候,我就定意不讲,但这位传道先生说:“最低限度也得由杨先生领开首礼拜,以后我讲书。”终于事情便如此定规了。我先登台,领礼拜的开首,我求上帝常帮助,读《罗马书》八章,唱诗,领祷,祈祷未完,众人已大受感动,祷告完毕,执事到台前请我讲书,我说,受托的事情,已经完毕,我便

①Nelson Bitton:《杨格非传》。

②更正教,即基督教新教,简称新教,或译为反对教、誓反教、改新教等,也经常被直接称为基督教,是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广义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

③王韬:《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3页。

④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本文对此多有参考。

下台,传道先生上台来,定要我讲书,于是我再登台讲道,众人心如火热,不胜惊异,有一致佩服的状态。礼拜一毕,长老、执事前来赔过,并把我的名字列入轮流讲道人之列,盼望再来。^{①p34}

初到上海的头两年,杨格非努力学习中文。“西人学习中文,不是易事,但他的才能,能副他的志愿。在英文威尔士言语上,既有特长,所以学中文、中语,也轻快而好。不久,便能操浅近的话,对人讲道。……次年,同本会的一位朋友教士到苏州去,到了城门,守门的把住不许外人进城。他绕城寻得水门,进得城去,在街上散书讲道。”^{②p1} 尽管如此,实际布道时的情形似乎并不理想,会场秩序混乱,缺乏庄重肃穆的气氛,听众也不虔诚,缺乏理解力和自我约束力,更多的是抱着凑热闹的态度:“西国人用中国话讲道,不是容易,必需明白中国话语,又要有忍耐心,不可因为小事,自己以为讨厌,生有拦阻,因为中国人不守聚集的秩序,多是随意自由来去,常是有人来一听,他不明白,或是不顺耳,不愿意听,一直的去了。或有来彼此谈话,或有人彼此问说,讲的甚麽。”^{③p41} 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不在于语言障碍和中国人的集会秩序。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如果交流双方的基本需要大致吻合,交流便可以顺利展开,但如果基本需要大相径庭,那么交流就会以破裂而告终。尽管杨格非等新教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煞费苦心,但其改宗信仰的基本目的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需要相去甚远。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引入另一种洋道统来代替本土的道统思想体系,而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术、思想及科学技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因而传教士的讲道经常遭遇中国民众特别是文人的抵制,杨格非在湖南布道时甚至性命堪虞。而其立意要将中国归入世界宗教秩序范畴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

二、圣教书局与杨格非的中文著述

杨格非最擅长的当然是讲道,但他在写作与翻译上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成就最长久的结果,是著述的一切书籍,几乎各省各地,都有他手著述的小册。在起初传道的时候,著书本不在预料之中,后来感到传道所必不可少的,是在于用书。已经慕道的,有书扶助以解释圣经,可以培养道心。未曾入道的,看劝世文可以引领入门。以前中国这类的书很少,杨氏先出一书,名叫《真道入门问答》,后又出一种赞美诗和种种的劝世文。”^{④p44} 杨格非是一位高产的作者,而且敢于尝试多种文体的写作,曾经是《万国公报》的重要撰稿人。仅1882~1883年他就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上帝之称》、《引父当道》、《引君当道》、《红侏儒传》、《引民当道》、《日月星真解》、《引家当道》等一系列论著。《万国公报》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传播西学

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大型中文综合期刊,这也无形中提高了杨格非的影响力。另外他还撰写了《真理撮要》(Selection of Important Truths)(汉口:汉口圣教书局,清宣统3年)、《德慧入门》(华北书会,民国元年)、《真道问答》(书名页等处题“真道问答入门”,成都:华西圣教书会,民国2年)、《莫包脚歌》(汉口:圣教书局,清光绪间)、《福音大旨》(华北书会,清宣统2年),翻译了《旧约诗篇》(汉镇英汉书馆,清光绪32年)等。

187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传教士大会,“有二十个教会,代表有一百二十六人出席,讨论组织一切布道方法。杨氏在会提出的问题,附以讨论的,如儒、释、道三教,教育文学,翻译书籍,建立分会,培养传道人材,各会联络合作。特别演讲一题:‘圣神与传道的关系。’他的言论,大感动了会众,大众承认他为教士中的领袖。”^{⑤p27} 杨格非将书籍的翻译和出版作为传道方式提到重要位置。

事实上,1876年杨格非得到伦敦会的助款,已在汉口创立中国基督教圣教书局(Religious Tract Society Hankow),这是中国较早设立的基督教文字布道机构之一。圣教书局的前身是圣经会。1876年为扩大影响,圣经会一分为二:一为圣教书会,专管出版发行;一为圣教书局,负责印刷事务,对外统称“圣教书局”,由董事会领导,董事长和董事都由牧师兼任。圣教书会在全国有多家。1913年华北圣教书会与汉口圣教书会合并。1920年华东圣教书会又与汉口圣教书会合并,以汉口为总会,并同时在沪、津、辽等地成立分区委员会。1931年9月,该会成为伦敦圣教书会汉口分会。圣教书会以出版发行基督教各教会在汉口的各种分会的书报为主,稿件由教会、神学院的教师、牧师以及其他教会名人的著作构成,往往半卖半送,价格从几分、几角、一元多到三元多不等。^⑥

圣教书会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编写印刷传教士布道时散发的传单和小册子。或许因为杨格非本人在宣教方式上,特别注重街头布道,因而在著述中也强调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创作。他所著的《德慧入门》“大有名誉,无论是信徒,非信徒,都以为饶有趣味。因为书内所讲都是福音要道,而且辩论详明,有学问者爱看,就是寻常人也能领悟,两方俱能受益,真不愧为一本好书。人看杨氏译的书,受社会的欢迎,所以苏格兰圣经会,请杨氏另翻《马可福音》作为样本,大众喜欢,以后便翻成《新约全书》。以前圣经会印发的圣书不少,但以后印者,有一八五〇年数位教士所译的文理《新约》。这种文理,在有学问者或是爱看,在寻常人难以适用。所以杨氏的另译,文字不深不浅,恰合中道,文人和普通人均可适用,印行样本,果受大众欢迎。”^{⑦p45} 杨格非所译《新约浅文理译本》1885年在汉口出版,1889年出版其修订本,后又用白话将之重写为《杨格

①Nelson Bitton:《杨格非传》。

②周光亚、舒兴文:《具有百年历史的圣教书局》,《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6月30日。

非官话译本》。

杨格非还有意识地创作和翻译一些宗教故事来吸引读者。如马皆璧(Mark Guy Pearse)所著宗教小说《红侏儒》(The Terrible Red Dwarf),1880年由 Wesleyan Conference Society 在伦敦出版。不久,杨格非就着手将之译成浅文理的《红侏儒传》,1882年由汉口圣教书局出版。《红侏儒传》曾在《万国公报》上分两次连载,题为“大英杨格非著 金陵沈子星书”。这是一篇隐喻性小说,以红侏儒隐喻人的舌头,说明流言的危害。小说共分四段:第一段论红侏儒及其所居之洞;第二段论红侏儒之役使;第三段论红侏儒在某村所行如何;第四段论红侏儒在村中如何被治服。在某村,红侏儒搅得村民鸡犬不宁,夫妻猜忌、朋友相离、邻里失和,仇敌并起,村民却制服不了它。一日,村中老人在邻村忽得一奇书,书中妙语连珠,老人每日揣摩,智慧大增。村民不时向他学习请教。正巧书中有论红侏儒之事,老人大喜。在老人的指点下,村民们摆脱了红侏儒的迫害,夫妇、亲朋重归和谐。小说最后揭示,老人所得奇书即《圣经》,红侏儒即舌头。《红侏儒》虽然是翻译马皆璧的小说,却颇多自我发挥的成分。他在书后的跋文中称:“余向在西国见一袖珍小本乃马皆璧先生所著,言红侏儒之事,意婉而深,辞腴而正,一再读之,发人猛省不少。壬午桂秋,译以中国文字。其间或芟其冗烦,或润以华藻,推陈出新,翻波助澜,是脱胎于原本,按字谨译也。阅是编者,谓之译可,谓之著可,谓之半译半著,亦无可。总之,不问是译是著,吾人于一话一言切宜领之。”小说最后附录了唐太宗与许敬字“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的著名对话,进一步印证红侏儒中外皆有,性情举动亦皆同。体现出对中国话本小说体例的某些元素的借鉴,即篇尾用相似或相反的小故事进一步点明主题。

圣教书局早年的出版物多用浅文理,后逐渐被官话所代替,这与杨格非有意识地倡导不无关系。尽管杨格非的大多数作品用浅文理写成,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的中国助手决定的。杨格非担任汉口圣教会第一任会长,该会早年的出版物大多由他口述、由他的中文教师沈子星笔录。“在城里乡下作传道工夫,有几位中国教友常是同伴,有一份帮助,像这样忠心的信徒,愿意受辛苦,受逼迫,对本国弟兄传扬福音真理。这几位和杨氏同事的,总算是道德伟人,或是尽力帮助说教,或用心帮助翻书,所以在汉口有这样效果,也都是协合作成的。”^①杨格非尊重中国助手的工作,他是少数几个将助手名字也列入作品的传教士之一。他曾经这样描述传教士与中国助手的合作过程:“当他们(传教士)想要出版的时候,他们就将这个意思口头传达给学者,由学者翻译成流利的、惯用的中文。尽管传教士可能自己不会写,但他应当能够对他

的学者的文字形成一种批评意见。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这种能力,这些都是必要的,为了结果能产生比传教士希望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能写出来的更具伟大价值的作品。”这显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在中国,文学表达的准确和精美历经许多世纪的熏陶培养而成为一种美好的艺术,也一直被推崇备至,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确定他会避免犯那些被训练有素的眼睛立刻察觉的错误,不触犯一个受过教养的中国人的敏锐的直觉,还不能使该中国人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写的作品退避三舍,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②

然而作为街头布道家,杨格非本人或许更关注大众的接受能力。他不仅把浅文理本的《新约》译成白话,还把他的小说《引家当道》也译成官话本《引家归道》。汉口周明卿在《引家归道》“译官话序”中揭示了杨格非这么做的原由:

壬午岁杨君格非牧师著有《引家归道》一书,详言李先生修身、齐家、正己、化人之事,已足徵圣道之感动人心,使人弃邪从正也。是书刊行数载,悦服者多,获益者亦不少。杨君复思是书之成,原期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文法纵非太深,诚恐村夫俗子未能精通文义者,无由观之了。于是依原本再译官话,俾揣摩无难,展卷即能明晰。余一再读之,窃以为人能若此,何患家道不兴,人心不化。庶几圣道大行,人皆良善,升平之宇,即在今日,乃无负作是书者之苦心云尔。 戊子冬汉皋周明卿敬序

杨格非在对官话的认识和运用上其实称不上先知先觉,米怜(William Milne)、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早已走在他的前面。不过,这至少表明,对于官话的重视在传教士中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并随着杨格非创办的圣教书局所发行的各类刊物和书籍,日益影响到中国社会和士人。

三、《引家当道》——展示理想的中国基督徒生活的小说

杨格非的小说《引家当道》1882年在汉口圣教书局出版,前面有金陵沈子星的一篇序文。沈子星,生平事迹不可考,当为长期客居汉口的下层中国文人、教徒,长期担任杨格非的中文助手。清同治十一年(1872),沈子星还曾与汉口伦敦会花楼会堂执事杨鉴堂共同创办过武汉地区最早的以传教为内容的民间报刊《阐道新编》,这份刊物于光绪三年(1876年)停刊。《引家当道》沈序云:

大英牧师杨君格非以所著《引家归道》十六章,前后言李先生笃行真道之事甚详。见示于余且嘱余为序。展读之余不觉喟然叹曰:“余仅如大荒中一微尘耳,何知有道,更何知有真道二十余年。……书言大旨乃勿以过小而不

①Nelson Bitton:《杨格非传》。

谨始,勿以善难而不倡先。教子有义方,循循以诱劝,人从真道,侃侃而谈,孝亲,敬兄,清欠,爱敌,仗圣神之大能竭自己之全力,卒至由亲及疏,多有入生出死者矣。嗟嗟当今之世舍李先生吾谁与归?此书一出,已信道者当更增其进修,未信道者亦可因以观感,立见真道光昌。兆民福乐,未始非此书默化所致也。余不敏,曷敢云序,惟以已得益于此书,并此书流行,预料其有益于天下后世。谨为悦道者言之。 壬午菊秋上浣金陵沈子星书于汉皋客次

《引家当道》是为了宣扬基督教而写作的,作品叙述了基督徒悔罪归道后理想的生活状态。1882年10月杨格非在一封写自汉口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这部小说:

我回来之后,除了诸如日常的传教、教书、照办教堂等工作之外,还写了6篇宣教作品。最后一篇今天完成,篇幅很长,我相信它会成为我所写的两篇最佳的作品之一。在这篇里,我描写了我心目中理想的基督教徒的生活,以及他应当如何努力拯救他的家庭、亲人和朋友。它类似小说,特别适合中国人。^①(P94)

1883年《万国公报》分十次刊载了此书。但是,小说问世后似乎并没有象作者期望的那样“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也没有象沈子星预期的那样在读者中流行从而“有益于天下后世”。杨格非将之归结为语言的原因,因而1888年他将浅文理的《引家当道》改写为官话本《引家归道》,回目保持不变,正文改用官话,1889年由圣教书局印行,前面有沈子星原序及汉口周明卿“译官话序”。

《引家归道》共十六章,目录如下:

- 第一章 后世情起落无常
- 第二章 听真理今昔大异
- 第三章 复天良游子归家
- 第四章 观善行哲妇慕道
- 第五章 儿死女存悲复喜
- 第六章 闻声放足理兼情
- 第七章 谎骂赌钱从幼戒
- 第八章 家庭礼拜照常行
- 第九章 圣神妙化求能得
- 第十章 真道微言问更明
- 第十一章 欠债还清毋再欠
- 第十二章 仇人善待不终仇
- 第十三章 奉老亲劝归真道
- 第十四章 找长兄救出迷途
- 第十五章 公道谋生为善策
- 第十六章 亲身见嫂入明宫

主人公李先生是最普通的底层民众,他平常得就象读者所熟悉的邻居、亲朋,甚至就是读者自己:他不是读

书人,不过知书明理。家中稍有积蓄,也有些田产,平日做些生意帮衬家用。娶妻何氏,门当户对,育有二男一女,家庭生活美满幸福。不料被浪荡子弟引入迷途,钱财荡尽,亲情疏远,甚至卖儿鬻女,生活难以维系。杨格非刻意塑造了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以取得读者的认同感。“李先生受到感化,从此时起,痛改前非,自己常常祈祷,德行一日兴旺一日,不久,奉圣教为主门徒了。从此以后,李先生最喜欢的就是为耶稣作见证,逢人必讲解真道,尽力劝他们信主得救,倘若有人疑惑,李先生就对他们说:‘主能救我这样的大罪人,岂不能救你们么?’因听他的言语,观他的行为,有许多人受了感动,并且与李先生往日相交的,和勾引他嫖赌的那些人当中,也有人改过自新,同归正教。还有多人,虽然不深明真道,也要奉教,为主耶稣的门徒。”^②

小说把重点放在走投无路的李先生如何通过悔罪归道获得新生,并感化家人和乡邻。“这部小说的确包含了一些教义,但中心在于对应当如何生活提出了实用的建议。”^③因而《引家归道》并不象其他的宣教小说那样,充满了连篇累牍的人物问答以阐发教义,而是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故事性。小说涉及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纳妾、缠足、抽鸦片、孝敬老人、教育子女、清还欠债、对家庭的责任感、诚信交易等问题。

《引家当道》在近代来华传教士原创小说中,是最具文学性的一部。这主要表现在小说人物的塑造方面。主人公李先生并不象其他小说中的正面人物那样,完全只是一个符号性的角色,是牧师的代言人,喋喋不休地向人讲道或与人辩论。作者将他还原成生活中的普通人,赋予他多重身份,除了是一名悔罪归道的信徒外,他同时还是丈夫、父亲、儿子和弟弟。小说并没有用太多篇幅记述李先生向他人布道的言论,而是重在展现他作为一名教徒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如何担负起生活中的种种责任,扮演好各种角色的。李先生和家人在生活中碰到了种种问题,都被身为基督徒的李先生一一化解,构成小说情节推进的动力。除了李先生外,小说还塑造了他的妻子、儿子、父母、兄长等人物,他们也都各有各的性格和特点,接近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比如写他的父母对于圣道的认识和接受过程比较客观,并未夸大圣道的影响力。虽然二老日日听讲圣道,只是难受感动,常说:“我老了,筋力衰了,旧性难改。圣经难记,不是少年强壮人,诸事灵便。”李先生夫妇成心求上帝,感化二老的心,使二老能信赖救主,终不失天上的永生,二老虽然不深明圣道,但看见儿子媳妇,相敬如宾,视为一体,孙男孙女,也晓得孝亲敬长,太和气象,聚在一门,常常叹说:“我们年近古稀,偏观别人家里,

①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②《引家归道》第二章,第3页。

不能像这样,若感化他们的不是真道,怎能有如此的美妙呢?道中的许多奥妙,我们实在是难得明白,但子媳全家的行为,却容易看见。如教中人,都是这样,信的人不得不一日多一日,教会快快兴旺,也是我心所愿的。”^①又如李先生帮助兄长戒大烟的痛苦过程,也得到了真实再现。

《引家当道》译为官话本《引家归道》之后,其社会和文学影响是否确实得到了提升,没有来自中国读者的直接信息可以证明。但是,美国传教士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将《引家归道》译成韩文在朝鲜半岛传播,似乎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它的影响力。

四、武林吉与《引家归道》的韩译本

武林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郭实腊有些相似,是一位个性鲜明同时颇具争议的传教士。武林吉1845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自幼熟读宗教书籍,为他日后的传教事业打下了基础。他富于热情和幻想,有着非凡的语言天赋,性格开朗,很容易与他人打成一片。这使得他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中国官话、福州话及朝鲜语。1870年他来到福建,创办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后更名为福州英华学校,1874年创办福建第一份中文报刊《郁山使者》(The Zion Herald)。1887年,由于他在传教和办学策略上与其他传教士产生分歧,武林吉被派往朝鲜传教,1895年10月才重新回到福州。^②与在中国时一样,他认为朝鲜民众的理解力有限,传教不能仅仅依靠在街头布道和散发书籍小册子,而应该尽力扩充民众的知识面,这样才能使他们更容易领悟基督教教义。抵达朝鲜伊始他就开办了一所日间学校,并担任学校的教师。1891年他创办了一种三语刊物,用中文、英文、朝鲜文印刷,作为向朝鲜中下阶层传播福音的工具,另外还创办了《朝鲜丛报》(Korean Repository)及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并且担任了第一任主理。

1894年武林吉将杨格非的小说官话本《引家归道》译成韩文,在汉城贞洞耶稣教会堂出版。此译本现存于韩国基督教博物馆。^③武林吉为监理会传教士,1889年在汉城培材学堂里创办了以印刷出版基督教典籍为主要事业的“三文出版社”。他是在韩国主动推行基督教文字传教事业的领导人物。

武林吉在《引家归道》“序”阐明了译介的目的:

这部书是英国牧师杨格非先生所作的,叙述中国李

先生虔信基督教,其故事内容真实,语言详尽,连小孩看都容易了解。因此重以韩文翻译出版,希望阅读者有过即时悔改。李先生奉养父母尽力孝道,恭敬兄弟,与妻子和睦,器重弟妹,恤导孤儿,宽待怨仇,清还负债等事,皆为值得我们效法。这些事决不是靠一己之力量成就的,就是承蒙上帝恩宠与基督代赎、圣神感化而成的。是故,希望世人皆像李先生一样尽力度信真道,转祸为福。

武林吉劝说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悔罪改过迁善,与沈子星原序及周明卿“译官话序”表达的意图大致相同。这里,他所倡导的对父母尽孝道、恭敬兄弟、与妻子和睦、器重弟妹、恤导孤儿、宽待怨仇、清还欠债等都是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相合的一面。韩国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语境,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基督教与儒学的某些契合点,为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武林吉的这段导读,可以说切中肯綮,迎合韩国读者的心理,基本上沿袭了合儒、补儒的传教思路。同时,小说主人公李先生修身、齐家、正己、化人之事,强调了基督教的精神力量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力,有助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重建。此外,在19世纪末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寻求精神安慰和解脱的韩国人把信仰基督教作为精神寄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说:“藉助于认同民族主义的情感,基督教在朝鲜较之亚洲其他绝大多数地方找到了更多的追随者。”^④这些都推动了《引家归道》在韩国的流传。韩国基督教博物馆除了收藏它的1894年刊本以外,还藏有1911年8月5日“朝鲜耶稣教会”主管、在徽文馆印刷的刊本。此版全用韩文,78页,文章隔写井然,半页十行,因为隔写的缘故,每行字数不一,多为17字或18字。吴淳邦据此推断,韩文的隔写方式从19世纪末叶开始,这种现代韩文的书写方式开始于基督教传教刊物,尤其是早期的基督教小说作品。其出版时间之早及其在书写方式的改革,开启了韩文的现代规范与韩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⑤这也算得上是《引家归道》这部小说流传带来的副产品了。此外,《引家归道》在中、韩的流传状况还促使我们思考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和韩国境遇不同的原因,进而从细节上讨论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 and 发展的具体过程。

[审稿、责编:陈松柏]

①《引家归道》第十三章,第17页。

②参见游莲《美以美会传教士武林吉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未刊稿。

③拜韩国崇实大学吴淳邦教授所赐,笔者已保存其复印件。

④参见裔昭印、石建国:《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92页。

⑤参见[韩]吴淳邦:《19世纪传教士中文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台湾:《东华人文学报》2006年第9期。

English Abstracts

Griffith John: Inveterate Preacher and His Chinese Novels

SONG Lihua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Griffith John was a Welsh Christian Congregationalist missionary in China and a pioneer evangelist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He became well known for his talent and passion of sermon. This brought him the title of Street Preacher. He was also a writer and a translator of the Bible and religious novels into Chinese. As an inveterate preacher, his Chinese works have its unique style. This paper studies his Chinese religious novels and its literary and social influence.

Key words: Griffith John; Chinese missionary novels; *Yin Jia Dang Dao*

The Fiction Romance of *San Guo Zi Tong Su Yan Yi*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Yiling Campaign

WANG Qiancheng

(Chian Three Gorges Universtiy, Yichang Hubei, 443002)

Abstract: Yiling Campaign was LUO Guangzhong's one of "The three campaign", not only the art in the war was the classic campaign, but the literary description is classic. The author enhanced Yiling Campaign legend color according to exaggerate the scale of war, change the nature of war, and so on, showed subtle fiction art of *San Guo Zi Tong Su Yan Yi*.

Key words: *San Guo Zi Tong Su Yan Yi*; Yiling Campaign; fiction romance

The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National Areas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Xiaowen¹ Chen Shili²

(1.Guangdong Institute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Studies, Guangzhou, 510180;

2.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Abstract: Minor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Guangdong's culture. The prosperity of minority culture is the need of coordinat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both in minority and in Guangdong,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province in culture,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national unity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gress. Guangdong is tak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comprehensive implementing the spirits of National Minority Cultural Confer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power province to develop the minority culture industry. Furthermore,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e industry in national areas should b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ority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ority-culture-product market as well.

Key words: ethnic areas; culture industry; Guangdong province

A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Reduplicate Adjectives in Guangzhou Dialect

Peng Yongmei¹ Gan Yuen²

(1.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2.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seven main structural forms of the adjective reduplicatives of Guangzhou dialect: AA type, AA' 咁 Otype, A-Atype, ABB type, AAB type, AABB type and ABAB type, it emphatically probes into the combination ability of adjective reduplicatives; the ability to serve as the composition of a sentence structure.

Key words: Guangzhou dialect; adjectives; reduplication; grammatical function